

一 鞠躬尽瘁为百姓

赤泉之族关西雄，问世挺生聊城公。

清白吏承先世风，卓哉不朽推立功。

——摘自《聊城县志》

（一）书香门第

杨以增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，道光年间进士，官至漕运总督。其藏书处名海源阁，并专辟宋存书室、四经四史之斋藏其精品，曾辑印《海源阁丛书》。他于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九月十六日，就诞生在聊城的一个书香之家。

聊城位于鲁西平原、京杭运河之滨，乃海内外著名的文物古迹和游览胜地，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。这里有许多动人的民间传说，秀丽的江北水域与灿烂的历史文物荟萃在一起，使聊城充满了诗情画意、神味古韵。在聊城悠久的历史，有一颗独放异彩的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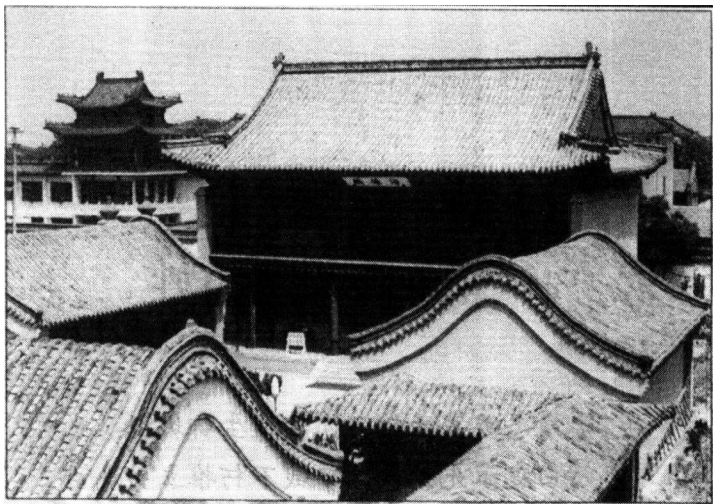


图 1-1 俯瞰海源阁

珠，这就是名扬天下的杨氏海源阁藏书楼。它是江北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长卷中重彩浓墨的一笔，为我国的学术、文化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聊城历史悠久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已是齐国西部的重要都邑，是当时齐国和燕国争战之地。隋唐以后，聊城一直为州、府治所。到了明清时期，



图 1-2 杨以增像

穿城而过的京杭大运河为聊城一带的经济带来了空前的繁荣。据说，当时穿越聊城城区的一段运河，全长约五公里，在位于东关大街东首的地方建有一闸门，叫做通济闸，聊城人呼之曰“闸口”，是运河之水流经聊城的必经之地。在明清两代，这里达到了鼎盛时期，不仅仅是南北商贾喜经之地，而且也是政府漕运必经之处，因而使得这里的过往船只常常发生堵塞。为了疏通船只，又在闸口东开凿了一条长约一公里的小河，命名为“越河”。随之，在越河两岸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商贸区，为了便于两岸往来，又在越河之上先后建成了 12 座形状各异的小桥，人们称之为“十二连桥”。由此聊城商贾云集，会馆林立，帆樯如林，百业兴隆，是京杭大运河九大商埠之一，被誉为“漕挽之咽喉，天都之肘腋”；“江北之都会”。经济的繁荣，也带来了聊城文化事业的昌盛。

光岳楼是聊城文明古老的象征，是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，当地老百姓对其有着特殊的感情，把它视为心中的宝贝，他们为有这样一座雄伟壮观的楼阁而引以为光荣和自豪。每逢“九九”重阳、新春佳节，人们便扶老携幼，来登临光岳楼。尤其是明清两代，京杭大运河是当时南北交通的大动脉，沿河过往的帝王将相、文人学士多都登临斯楼，眺望开阔的鲁西平原，凭栏咏月，作诗赋词。据《东昌府志》和《聊城县志》以及现存碑刻中就有大量的诗文，尤其

是清朝的乾隆皇帝 11 次东巡、南巡，九次过聊城，五次登上光岳楼，前后作诗 13 首。除此之外，聊城还有著名的铁塔和山陕会馆。

聊城物华天宝，人杰地灵，历史上出现过许多著名人物，其中，既有治国安邦的贤臣良相，又有御敌守土的民族英雄；既有著述等身的饱学之士，又有名扬天下的书画大家。明清两代，聊城文运大开，出现了以任、邓、朱、傅、耿五大家为代表的一大批文人学士和名宦重臣。据考证，清代山东考中状元共六名，聊城独占其二。杨以增的家就位于著名的光岳楼南万寿观街路北，离京杭大运河只是一步之遥。这样的经济背景，和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，不能不影响着杨以增幼小的心灵。

聊城的杨氏家族，据《聊城县志》载，原不是当地的土著，先世为秦人，是从陕西华阴县迁徙到山西洪洞县的，到了明代初期，以军功授临清卫指挥之职，占籍临清。入清改为东昌卫，杨氏遂为聊城人。杨以增的高祖永禧，结婚两年后便去世了，高祖母唐氏年仅仅 21 岁，儿子帝钊只有三个月。上有老下有小，家中又一贫如洗。在这种状况下，唐氏含辛茹苦，节衣省食，日夜操劳，把儿子抚养成人，奉养公公 35 年，奉养婆婆张氏 34 年，并且先后为二老送终。据杨以增回忆说：那时的事情已经很久远了，不太了解，只是听奶奶讲过。奶奶曾说高祖母性情温

顺，待人和蔼，乐善好施。如果有贫困家庭的妇人来到家中，高祖母一定会诚恳地拿出一些钱或米来接济他们。如果有谁家的孩子跑到家里来，高祖母也一定会高高兴兴地给他们许多好吃的东西。为了应付这样的事，心细的祖母赵氏便常常预先准备好这些钱物，放在婆婆的房子里。祖母赵氏也因此得到婆婆的欢心。当时，著名的学者钱仪吉听了杨以增的话，无不感慨地说：从高祖母、祖母的身上，我们就能够深切体会到杨氏先人是如何来治家和教育子孙的。

杨以增的祖父杨如兰，字德馨。性格刚直不阿，胸有大志，曾为县吏。乾隆三十九年（1774）八月，临清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。起义遭到残酷的镇压而失败后，清军进行了疯狂的屠杀。当时，山东巡抚下达文书命令东昌府搜捕党羽，大量百姓遭到株连。当时，杨如兰为县吏。他对于清政府的这一做法十分不满，但自己职微言轻，不会起到大的作用，只是敢怒不敢言。他为了保全这些无辜的百姓，到了深夜，点着自己床上的帷帐，连同记载被牵连者的花名册一起烧毁。第二天早晨，杨如兰又把自己捆绑起来，跑到巡抚那儿负荆请罪。说由于自己不小心，床上着了火把花名册烧毁了。巡抚看到事已至此，也无可奈何，最后事情不了了之。正是由于杨以增祖父杨如兰的心地善良和机智多谋，才使得聊城众多被牵连的老百姓都得以活命。清代学者孙星衍因此称赞杨如

兰为“义士”。

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，字炳南，一字熙崖。据史料记载，杨兆煜小时候就十分端庄稳重聪明，听从父母和老师的训诫，孝顺有规矩，而且很懂事。由于学习刻苦，所以，在童子试时，一举夺魁，考取了第一。此后，在 1798 年考中举人，1808 年会试中进士，在 1813 年铨选为即墨县教谕。

当时，即墨县前任教谕和县令关系不融洽，他们之间存在着一些矛盾，相互揭发对方的阴谋和隐私，结果前任教谕不幸而丧命酿成了大狱。随之，学生与县令相持不下，使得许多学生也被牵连进去。掌管视察和指导学校工作的官员，连续上书朝廷，控告学生。有一些学生或被关押而死，或死在逃跑的路上，五年之后才审判定案。当时，众多的教官都缩手缩脚，不敢伸张正义，由于这个原因，当地的士人都瞧不起教官。杨兆煜到任后，恪守己职，严格要求学生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，来稳定士人的情绪，改变他们对教官的看法。然后谆谆教导士人、学生要以前事为鉴，接受教训，明白事理。经过他的开导教育，使得即墨人士，都积极响应，把杨兆煜视作知己，并纷纷把自己的子弟送到县学学习。

杨兆煜在为即墨教谕时，父亲已经去世，母亲赵氏跟随他在即墨生活。在即墨生活了五年，母亲赵氏开始思念家乡，想回聊城老家看看。杨兆煜就以母亲

年老体弱需要照顾为由，自己上书请求辞去教谕一职，陪同老母亲还乡，使得母亲能够颐养天年。得到上司的允许后，杨兆煜便奉母还乡，从此不再出去做官，而是在家侍奉母亲。据说，他每天在家陪着母亲，总是满脸堆笑，不敢有丝毫的怠慢，并且时常给母亲读书讲故事，老母亲听到精彩的地方，就十分高兴。有时当老母亲心中闷闷不乐的时候，杨兆煜一定会长时间地跪在母亲面前不敢离开半步，而是想方设法耐心地劝慰，直到老母亲不再生气高兴了为止。此时的老母亲，已是 90 岁高龄，杨兆煜也已是 60 多岁的人了。但他侍奉自己的老母亲依然是尽心尽责，一点也没有感觉出自己也已是花甲之年。老母亲去世时，丧礼全部依照宋代的家礼，十分隆重，他并且训诫儿子杨以增建立祠堂，规制一律按照《大清通礼》中规定的去做，不能有半点差错。

杨兆煜学问功底深厚，论帖、品诗、读画，样样皆通，具有较高的鉴赏能力，平时喜欢朗诵陆渭南、吴祭酒的诗文。他在教授学生的过程中，以宋初胡安定的“苏湖教法”，根据学生的特长，进行分斋教学，经义、治事分别讲授，循循善诱，真诚恳切，抓住重点，深入浅出，深受广大弟子的欢迎。后来，有许多弟子都功成名就。上级长官听到了这件事后，想把杨兆煜向上推荐而被他自己拒绝了。后以奉养老母为名坦然离去。杨兆煜在任期间廉洁公正，离任时竟是囊

空如洗，身无分文。

杨兆煜老母亲去世之时，儿子杨以增此时在南方做官。料理完母亲丧事后，杨兆煜并没有随儿子去楚中，而是在家为母亲尽孝守丧，每日亲自耕作，粗茶淡饭，在房内经常哭泣。这时已是 66 岁高龄的他，在家侍候老母亲和为老母亲守丧尽孝的行为，深深地打动了远舍近邻，他们都为之而感动，认为杨兆煜是一个大孝子。

杨兆煜为人仁义宽恕，纯朴正直，自己自称是“实夫”。如果朋友做错了事，他就会心直口快地劝告你，而自己决不会后悔。当别人有了急事就如同是自己有了急事，一定会想方设法为你解决。他平生喜欢山水，在即墨的时候，曾经游览过二劳。在襄阳时，尽管年龄已高，但仍然时常游历于鹿门、隆中、岷山、习池等山水名胜。当时正赶上修孟亭，只是他的身体虚弱，病情加重，不得不躺在床上度日，就是这样他还念念不忘孟公，把孟公的画像挂在墙上，以示敬仰之情，并为之作赞。可见，杨兆煜一生自始至终都是为人师表，死后乡人追谥为“孝直先生”。他曾经这样说：忠孝是人的天性，一个人一定要恬淡自在，而不能有任何的不良嗜好，这样，忠孝才能够不被夺走而丧失。

（二）起州县家

正是有如此美好传统的家庭，有杨兆煜这样的父亲，才会有杨以增这样的儿子。杨以增，字益之，号至堂，一号东樵。杨以增小时候就十分聪明，秉承家学，博览群书，精通诸经，被当时著名的经学家王引之器重。王引之，江苏高邮人，清代著名的儒家学者，经学家、语言文字学家。他的父亲王念孙也是当时著名的儒家学者、经学家，是著名的学者戴震的学生，致力于音韵、文字训诂的研究。由此可见，王引之学问绝非一般，而杨以增在小时候就能够得到王引之的赏识，也可见杨以增学问功底之深。所以，杨以增在 17 岁进入县学学习，刚入学就被补为博士弟子员，享受清政府规定的每年每人发给生活费白银四两的待遇。正因为如此，杨以增在学校是名声大振。杨以增尽管成绩优异，但为人正派诚实，在同学面前从不趾高气扬，高人一等，反而在每一次考试时，成绩一定不会超过其他同学。

杨以增于 1819 年中举人，1822 年中进士，然后被分发到贵州以知县用。到达贵州后，暂时担任长寨同知。刚刚到任，就碰上一起官司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有一个人要和妻子离婚，杨以增问明原委后，苦口婆心地劝告那人不要休掉自己的妻子，从早晨一直劝说

到晚上，坚持不让他们离婚，最后，终于说服了夫妻二人。两人后悔得流下了眼泪，连连给杨以增磕头。就连旁边站班的一位年老的差人，也深深地被感动了。以致在后来，杨以增每次处理政事的时候，那位年老的差人都是洗耳恭听，不断地点头叹息，有时甚至是老泪纵横。杨以增任期届满被调离时，那位年老的差人也来送别杨以增，他泪流满面地对杨以增说：小人我已经是 70 岁的人了，还没有见到一个父母官像您这样真心实意地为老百姓办事的，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啊。

1824 年，杨以增补荔波县。到达荔波县后，县吏告诉杨以增，本县的居民大多是苗族，他们性情暴躁，凶狠强悍，特别不好管理。同僚们都问他说：这里的苗民都逃避徭役，你来了他们就会改变吗？大家都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他，怀疑他有什么特殊的办法。结果看到杨以增每天只是和书院里的学生们在一起说经习文，探讨学问，再也没有什么其他高深的法术。但是，隔了不久，事情却发生了大的变化，苗民对这位新来的父母官竟是俯首帖耳，没有一点先前那种反感的情绪，当在服徭役的时候，人人争先恐后，生怕被别人落在后面。同僚们为此都心服口服，认为杨以增真的神了。

1828 年杨以增被调到贵筑，1829 年升松桃直隶厅同知，1832 年又提拔为松桃兴义府知府，次年，

再次被调到贵阳。在这段时间内，杨以增先后于乙酉（1825）、戊子（1828）两次担任乡试同考官。在这两次考试中，都是公正合理，没有出现任何违法乱纪行为，并且一大批知名之士都被录取。

在贵阳，杨以增处理了大量被积压下来的疑难复杂案件。按照清政府的规定，凡是一省的重大诉讼案件，必须经由首府的最高长官审查判定后，才能够最后定案。杨以增到达贵阳时，积压的案件达数百件之多。杨以增并没有因为是前任遗留下来的而置之不理，而是逐一仔细地进行了清理审核，终于使这些积案得以了结。在这些积案中，当以杨以增处理的购买顶凶的案件最为著名。当时，在黎平出现了一件奇特的诉讼案件，一个人犯了法后，为了逃避法律的制裁，就买通了一个人来替他顶罪，而这个冒名顶替的人将要被处以极刑。杨以增重新对犯人进行了审理，最后了解到事情的真相。杨以增认为，如果放纵真正的罪犯，而杀戮了无罪的人，就是滥杀无辜。这种风气是绝对不能助长的，应当严缉真正的罪犯，使之正法，得到应有的惩罚，而无辜的人应当无罪释放。所以，杨以增依照法律，把真正的罪犯绳之以法，无辜的人得以平反昭雪。

由上可知，杨以增在初仕之时，就能够恪守职责，尽心尽力。他也确实为当地老百姓办了不少实事、好事。也正是这个原因，杨以增不但受到当地

百姓、同衙官吏们的好评，而且，也受到清政府的褒奖，于 1834 年晋升为广西左江道。

（三）洊历开府

1834 年，杨以增晋升广西左江道，随之又调任湖北安襄郟荆道。他所管辖的这一地区和秦、楚、豫等地区交错相连，风俗以凶狠强悍著称，许多人都是以做强盗为生。他们出没不定，不易捕获，成为地方官吏尤为头痛的一件大事。杨以增到任后，与提督罗思举在郟阳会晤，经过详细周密的计划，决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，严防死守，坚决打击，最后，使得辖区内强盗大大收敛，几乎绝迹。提督罗思举久经沙场，战功显赫，因此，他居功自傲，别说一般的同僚，就连贵戚和重臣他都瞧不起，但独独看重杨以增，对杨以增特别礼敬，说他能够治理强盗。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：有一位寡居的民妇，一天在自己的家门前被一个地痞无赖调戏辱骂了一顿，老妇人十分气愤，但又没有任何办法，只好一死了之。后来，这个无赖之徒被官府逮捕，杨以增经过审讯，了解到事情的真相。杨以增十分愤怒，决心严惩强盗。随后，杨以增和提督罗思举经过协商，下令大肆搜捕辖区内的强盗，并把他们全部绳之以法。

1838 年，父亲杨兆煜去世，按照当时习俗和清

代官吏制度，杨以增辞官回乡治丧并为父亲守孝。屋漏又遇连阴雨，父亲的丧期未满，继母赵太夫人又病故，杨以增不得满怀着悲伤之情，在家乡把两位老人的丧葬处理完毕。两位老人的丧事，杨以增一切都是按照丧礼来进行的，他的做法受到父老乡亲们的称赞。守丧期满以后，杨以增被授以河南开归陈许道。清政府向来十分重视河务，从清初朝廷就把“三藩”、“河务”和“漕运”当做三件大事来抓，所以，每当黄河发生重大险情之时，皇帝便会派遣钦差大臣亲临河工督视。这次也不例外，当黄河在样符一带决口的时候，冲溃堤坝和桥梁，滚滚洪流，自南而北，呼啸奔腾，大有吞噬一切之势。如果不能及时得到堵塞和治理，任其发展，不仅聊城会毁于一旦，而且，还会直下天津，威胁北京。东昌知府不敢怠慢，迅速上奏朝廷，请求派员治水救灾。皇帝派遣了钦差大臣亲临河工督视，杨以增也奉命督修河坝工程。在黄河岸边，杨以增不顾个人安危，从早到晚，一步也不离开，奋战在河堤之上，在最危险的地段都是亲自指挥，即使是风吹浪打，也全然不顾。有时在水势尤为紧急、民工们不知所措的情况下，杨以增就连官服也来不及脱下，用力扛起沙袋就奔向激流之中，在他的鼓舞和带动之下，民工们齐心协力，拼死搏斗，终于把决口给堵住了。当人们在欢呼庆祝之时，发现杨以增不见了，河工们到处寻找，看到他已经倒在水中，

累得精疲力尽了，再也没有力量回到岸上来了。经过几个月的艰苦努力，最后，杨以增带领民工们终于堵住了决口，修治了大堤，圆满地完成了清政府交给的任务。

这次黄河决口，没有造成任何灾害和损失，当地的老百姓和民工们都说杨以增出力最多，功劳最大。也正因为此，完工后皇帝赏给了杨以增一笔银子。杨以增就用这笔银子在自家院内建起了海源阁藏书楼。

1843年，杨以增晋升为两淮盐运使，还未来得及上任，他又被任命为甘肃按察使。当时，边区内的“不法之徒”夏长春、毛智远等聚集百姓学习白莲教。白莲教在当时属于非法之教，清政府是严厉禁止的。杨以增到任后，马上拘捕了他们。但是，首犯李一元是四川人，其他的白莲教信徒也大量分布于周边各省，尤其是以陕西省最多。杨以增为了使白莲教徒全部就擒，于是，他分别秘密写信给四川总督和陕西巡抚，并且向其它各省发布消息，联合搜捕白莲教徒。结果，白莲教徒被一网打尽，全部就擒。在甘肃，杨以增还办理了一件难案。中卫县有一个人，说因为他的童养媳不听自己的话，所以把她给活活打死了。杨以增仔细阅读了卷宗，又对那童养媳的尸体进行了检验，发现那女子遍体鳞伤，没有一点好地方，认为这其中一定有其他原因。于是，下令把那男子抓来，经过严厉的审问，那男子才终于说出了事情的真相。原

来，男子硬逼童养媳为娼妓，来为他赚取钱财，而那女子坚决不从，于是，便被那人给活活的用火烧烤死。杨以增最后把那男子按律处以极刑，为那童养媳昭雪平反，并且褒扬了她那坚贞不屈的精神。

杨以增在代理甘肃布政使时，清政府下令对边境地区进行勘测，以便作为加赋的依据。杨以增写信给上司，反对政府的这种做法，认为西陲边远地区，土地贫瘠，本身就收获不到多少粮食，如果一下子增加赋税，老百姓是无法承受的。杨以增的上书尽管没有被完全采纳，但还是有几十个县加派之后又停止下来。这样，许多的老百姓都得到了实惠。老百姓也都认为这是杨以增的功劳，所以，当地百姓很长时间都念念不忘。

杨以增在 1846 年担任陕西布政使。在任时，正赶上陕西大灾，庄稼几乎颗粒不收。清政府下令赈济百姓。在赈济过程中，杨以增选派一些正直无私的官吏和乡绅，制定了一系列相应的制度，使他们互相制约，互相监督，保证不出现任何差错。由此，老百姓得到实惠，流民也得以聚集，不致流离失所，这样，给政府减少了许许多多的隐患。

接着，杨以增在好友、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的极力推荐下，担任了陕西巡抚之职。林则徐，字少穆，福建侯官（今闽侯）人，嘉庆进士。1838 年（道光十八年）在湖广总督任内，禁止鸦片，卓有成

效，为禁烟派代表人物。于是被受命为钦差大臣，赴广东查禁鸦片输入。次年到广东，与总督邓廷桢协力查办，严令英美烟贩缴出鸦片 237 万斤，在虎口当众销毁；并积极筹备海防，倡办义勇，屡次打退英军武装挑衅。1840 年 1 月任两广总督。鸦片战争爆发后，他严密设防，使英军在粤无法得逞。因受投降派诬陷，被革职。次年派赴浙江，筹划海防，不久充军新疆，后起用为陕西巡抚。后林则徐因病引归，亲疏奏荐杨以增代理陕西巡抚。

杨以增与林则徐的关系，至迟是在鸦片战争的前二年，在林则徐的日记中可以知道。林则徐在 1838 年的日记中写道：五月朔日，署臬司杨至堂自襄阳到省来见；五月十日，杨至堂来署晚饭；六月三十日，卯刻，杨至堂往襄阳奔丧，与同人赴其寓送之。当时，杨以增任湖北安襄郢荆道员，林则徐正任湖广总督。杨绍和在《海源阁珍藏尺牘序》中写道：林文忠公与先君同宦楚、豫、秦、陇，投分最密。丙午（即道光二十六年，1846 年），文忠抚关中，将引疾归，适先君擢藩两陕，遂举以自代。有“诚正清勤，明敏练达，实臣所不能及”云。古所谓知己者非欤！在杨绍和编著的《杨端勤公奏疏》中，有很多是在林则徐和杨以增交替前后期间二人联名的，其中有些是林则徐任内的工作，而在杨以增接任后完成的事情。

有一件事情，最能体现二人之间的这种道义之交

的深厚。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林则徐由陕西调任云贵总督离开西安时，行前把自己所珍爱的一柄防身宝剑，解赠给了杨以增，作为一件永久性的纪念品。这柄宝剑是林则徐鸦片战争后在广州购买的，一直佩带在身，从没有分开过。尤其是当他被谪戍边时，准备必要时作为自裁之用。三年之后，林则徐病逝，杨以增一直把它作为稀世珍宝保藏起来。杨以增在咸丰五年逝世于清江浦江南河道总督任内后，从杨绍和、杨保彝到杨承训三代，都把这柄宝剑作为传家宝物悬挂于海源阁藏书楼中。据杨承训先生讲，他在少年时代就曾用这柄宝剑学习过剑术，剑身有许多血斑，剑刃与剑鼻相接处有一如同小米粒大小的缺口，锐利异常，这一件富有诗意的纪念物，在杨氏家中传了四代。在 1929 年和 1930 年的内战中，这件宝贵的历史文物，也随着其他无数金石书画而流散。

由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杨以增和林则徐之间的关系非同一般，并且，从中亦体现出二人志同道合与精神面貌。关于二人的这种关系和所作所为，高志超先生曾经这样论述和评价道：杨氏在其故乡聊城建海源阁藏书楼，正是鸦片战争发生的同一年，两位挚友的作为，竟是如此巧合？如果说，林氏烧鸦片，抗击英国侵略军，是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庄严；那么，杨氏在战乱之际建海源阁，尽收湖广、江浙一带流散精善本书籍，以海之源，追溯而保存中华民族固有之文